



主编 普繁仁

副主编 祁海文 刘彦顺

中国美育思想通史

魏晋南北朝卷

卢政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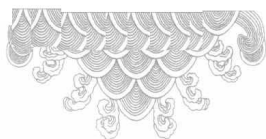
主编 曾繁仁

副主编 祁海文 刘彦顺

中国美育思想通史

魏晋南北朝卷

卢政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美育思想通史·魏晋南北朝卷/曾繁仁主编;
卢政著.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7-209-09837-3

I. ①中… II. ①曾… ②卢… III. ①美育—思想史—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G40-0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43896 号

责任编辑 李楠

助理编辑 王菲 廖吉广 骆永顺

中国美育思想通史 魏晋南北朝卷

曾繁仁 主编 祁海文 刘彦顺 副主编

卢政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社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话 总编室 (0531) 82098914

市场部 (0531) 82098027

网址 <http://www.sd-book.com.cn>

印装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规格 16 开 (170mm × 240mm)

印张 26

字数 375 千字

版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

印数 1—1000

ISBN 978-7-209-09837-3

定价 10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概述	1
第一节 新的时代思潮的影响	9
第二节 时代特征与内在理念	53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美育实践的多元发展格局	88
第二章 人物品藻与人格美育	133
第一节 玄学、人物品藻与新美育观念的树立	134
第二节 《人物志》的美育思想	148
第三节 《世说新语》的美育思想	168
第三章 曹魏时期的美育思想	205
第一节 曹魏时期美育发展的基本状况	205
第二节 阮籍的美育思想	213
第三节 嵇康的美育思想	226

第四章 两晋时期的美育思想	242
第一节 两晋时期美育发展的基本状况	243
第二节 葛洪的美育思想	251
第三节 王羲之的美育思想	266
第四节 慧远的美育思想	279
第五节 陶渊明的美育思想	288
第五章 南北朝时期的美育思想	298
第一节 南北朝时期美育发展的基本状况	299
第二节 宗炳的美育思想	312
第三节 刘勰的美育思想	324
第四节 钟嵘的美育思想	347
第五节 “四萧”的美育思想	365
第六节 颜之推的美育思想	387
参考文献	401

第一章 概述

魏晋南北朝（220—589），又称三国两晋南北朝（还有学者将其称为魏晋六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阶段，上接秦汉，下启隋唐，是介于两个统一帝国之间的分裂动荡时期，同时也是继承秦汉历史遗产、孕育隋唐文化高峰的时期。这个时期共369年，自220年曹丕建魏（曹魏）开始，到589年隋朝灭南朝陈而重新统一结束。这个时期大致分为曹魏时期（魏、蜀、吴三国并立）、两晋时期（含西晋、东晋与十六国两个阶段）、南北朝时期（南朝与北朝对立，共150年）。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社会大动荡、民族大融合的时期，更是一个文化大发展的时期，一个充满活力的艺术创新的时期。这一时期，军阀分割据，大小战争不断，朝代更替频繁，社会动荡不安，百姓颠沛流离，门阀士族垄断政权，寒门庶族倍受压抑。混乱和动荡也带来了思想的解放、学术的自由和理论的自觉。文学艺术从经学的附庸地位中挣脱出来，获得了独立，走向了更为广阔的天地。这一时期，在文艺思想、艺术的题材、体裁以及整体风貌上，都呈现出许多新的变化。

从一定意义上讲，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美学的自觉期，亦是中国美育理论的发展分化期”^①，是中国美育发展史上一个承上启下、走向繁荣的转折时期。

众所周知，中国古人历来重视美德、美行，自先秦以来两千多年的

^① 钟仕伦：《魏晋南北朝时期美育思想述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10期。

漫长历史进程中，美育始终融汇、贯穿于中国传统教育的各个方面。从上古“先王乐教”到儒家的礼乐教化，一直到今天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美育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美育思想源远流长，内容丰富。虽然各个时代的美育思想受到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哲学思潮、伦理道德、教育理念、审美意识等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是从整体上看，中国古代美育的发展一直贯穿着“中和”观念。“中和”既是中国古代美育的内容，也是中国古代美育的手段，更是中国古代美育的目标。中国古代“中和论”美育注重美善统一，美育与德育、智育的统一，以儒家礼乐教化思想为主体。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统治者普遍意识到只有使老百姓具有了符合封建统治要求的道德规范和良好“资质”，方能有效地施行政令律法的管理与约束，于是美育便成为统治阶级理政御民的治理策略中重要的一环。在这期间，虽然有起落、有反复，但儒家美育所倡导的以德治国、礼乐并举、中和位育思想一直延续了下来，历代文人知识分子都主张用使人欢快、使人乐于接受、为“人情之所必不免”（《荀子·乐论》）的“乐教”“诗教”来陶冶人心、塑造人性。到了近现代，许多美学家和教育家如蔡元培、朱光潜等也都继承了这一观点，在审美教育的实践中将艺术作为道德教育和政治变革的重要手段。当代美学家曾繁仁先生提出了“中和论”美育观的概念，他认为中国古代美育思想的核心是“致中和”，是一种建立在“天人合一”文化理念基础之上的“中和论”美育观。^①

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古代美育源于上古“先王乐教”的传统。《尚书·尧典》载：“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段文字被很多人认为是有关中国古代美育思想的最早文献。此外，《周易》《吕氏春秋·古乐》《史记·乐书》《礼记·乐记》等典籍中也有类似的关于“先王乐教”的记载。曾繁仁先生以两

^① 参见曾繁仁：《美育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5—293页。

汉为界限，将中国古代美育史划分为两个阶段，有学者分别将其称为“主体成熟期”和“观念建构期”，认为“主体成熟期”又可进一步分为不自觉的美育活动和自觉的美育活动两个阶段，其中不自觉的美育活动是美育思想的起源阶段，这一阶段的美育活动与原始宗教活动即巫术礼仪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① 早期人类主要通过巫术礼仪和诗、乐、舞表达对自然和自身的认识，并未有意识地将其与教育合并，但是它为华夏美育思想的产生提供了观念支撑和历史文化基础。因此，从某种角度而言，中国上古时期已然出现了审美教育的萌芽，“先王乐教”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美育的早期形态。

如果说中国古代美育思想观念源自上古的“先王乐教”及西周“制礼作乐”的传统，那么其发端则是春秋时期的说“礼”论“乐”风潮。春秋时期，在“礼崩乐坏”的文化背景下，上古以来的礼乐教化美育传统遭到来自道、墨、法诸家的激烈批判乃至否定。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始终坚持以诗、书、礼、乐之教为主，对诗、礼、乐等的美育功能、意义进行了丰富的理论阐述，同时又积极参与与道、墨、法诸家的礼乐论辩。

西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因得到了官方认可，其正统地位得以确立。董仲舒提倡“独尊儒术”，其美育思想也承袭了先秦儒家的观点，儒家美育思想也由此成为中国古代美育的主流观念。也是在西汉时期，中国第一部系统阐述美育思想的专著《乐记》成书^②，它标志着中国古代美育思想走向完备与成熟。《乐记》较为系统地对先秦以来的乐教思想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同时对汉代学者在美育方面的思想成果也有所介绍和反映。《乐记》奠定了中国古代美育的基本观念和发展方向，其后的中国古代美育基本上是承袭其基本理念和思想主旨而不断拓展和完善的。可以说，

① 参见郑和玉：《曾繁仁“中和论”美育思想研究》，山东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第6页。

② 关于《乐记》的成书时间，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乐记》为战国时期公孙尼子所作；一种说法是《乐记》为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校先秦古籍所得。目前学术界比较公认的观点是《乐记》成书于汉代，但其思想资料来源于先秦诸子言乐事者。

从孔子、孟子到荀子以及汉代的《乐记》等，以礼乐教化为基本观念的美育思想逐步形成并确立，但是汉末的社会动荡极大影响了中国古代美育的发展进程。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玄学、佛教等多种思想学说的共同影响下，逐渐形成了以“和”为核心的美育思想，使得中国古代“中和论”美育观发生了重要转向，并得以不断深化。

汉末魏晋南北朝约有四百年的历史，此间的社会政治制度对古代“中和论”美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东汉末年宦官外戚专权最激烈的时代，由于皇帝的昏庸无能，政治权力落到了外戚、宦官手中，在内他们蒙蔽皇帝、杀害忠良，在外勾结豪族、土匪，结党营私，卖官鬻爵，穷凶极恶，无恶不作。朝廷政治的黑暗导致了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最著名的就是灵帝时期的号称有三十万之众的黄巾军大起义。在这种混乱的年代，不仅战乱、饥饿和死亡在无形中笼罩着人们，党祸更是成为迫害读书人最直接的手段，例如汉桓帝和汉灵帝时期发生的党祸，受到迫害和诛杀的读书人、正直官吏达九百多人。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为了保全性命，只能远离政治，隐名避世，寄情山水，谈玄说理。但是，政治的黑暗并不能扼杀一个时代的文化，正如宗白华先生所指出的：“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①正是由于政治的黑暗，知识分子被迫远离朝堂，他们才能一心专注学问与艺术，这也造就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伟大的文化艺术宝库，促进了魏晋南北朝美育思想的极大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才选拔和教育体制对“中和论”美育思想的发展、深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曹操颁布了求才三令，实行了新的选人用人政策。据《三国志》记载，建安十五年春，曹操下令：“自古受

①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7页。

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① 曹操将“才”作为选人用人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同时，他的“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的诗句也反映了他对人才的急切渴求。曹操唯才是举的人才选拔政策不仅将大量有用之才汇聚到其身边（如荀彧、荀攸、程昱、贾诩、司马懿、钟繇、戏忠、郭嘉以及杜畿等人），对于巩固其统治有重要的作用，而且打破了汉代独尊儒术的桎梏，打破了儒家以德治天下的传统，标志着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上的大变革，为魏晋南北朝各种学术思想的活跃打下了政治制度上的坚实基础，更为中国古代美育思想的深化发展开辟了道路。其次，曹丕做魏王时，“制九品官人之法”，即把人才分为九品，唐代杜佑《通典·选举二》对其做了详细解释：“区别所管人物，定为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则升进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义亏阙，则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② 从其中的“言行修著”和“道义亏阙”，我们可以看出人的性行的善恶成为人才选拔的标准，这就标志着曹操唯才是举的人才选拔方法的终结。这时的以德选拔人才的方式，又将儒家伦理道德因素加载到政治生活中。其实这并不是独尊儒术的复兴，而是统治者为了巩固其封建统治而与封建世族联合的结果。因为只有出身世族的人才能被定为上品，进入朝堂任高级官吏，这也形成了当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③ 的情形。封建世族掌握了国家政权，具备了良好的客观条件，非常重视家族教育，从而促进了魏晋南北朝家庭美育（家族美育）的兴盛，也极大促进了中国古代“中和论”美育思想的深化与发展。再次，国家教育体制也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美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

① 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页。

② 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28页。

③ 房玄龄等：《晋书·刘毅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74页。

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学校分为太学和国子学。魏文帝黄初五年（224），立太学于洛阳。晋武帝泰始八年（272），太学学生达到七千多人。西晋在太学之外设立国子学，但是只有宦宦之后才能进入国子学，而且父亲的官品必须在五品以上，可见国子学主要是为贵族大家族设立的。以后学校虽然兴废无常、起起落落，但是官吏选拔依旧是由世家大族举荐，因此学校在国家选拔人才方面的实绩并不突出。但是到梁武帝时，国子学出身并做官的人就已经很多了。虽然北朝时期人才选拔再次陷入门资之争，但是梁武帝时期学校教育确实得到长足发展，并且不限制出身，如《隋书·百官志上》写道：“旧国子学生，限以贵贱，帝（梁武帝萧衍，引者注）欲招来后进，五馆生皆引寒门俊才，不限人数。”^① 学校教育的发展必然对美育思想的深化及美育的实施产生重要影响。

除了政治方面的原因，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思潮、学术思潮的新变化也对“中和论”美育思想的深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社会思潮、学术思潮的新变化主要表现为经学的衰微、玄学的兴起和佛教的兴盛。首先，自东汉末年开开始，传统儒学日渐衰微。两汉时期，在统治阶级“独尊儒术”的思想钳制之下，经学家们只能局限于文字训诂层面，专注于注经解经，以致后来出现了繁琐僵化、不注重精神实质的现象，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压制了个性自由。因此，汉代比较沉闷、保守的思想局面与经学的大一统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后来谶纬经学的发展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其浓重的神学封建色彩也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汉魏之际，随着王充、曹操等人对天命、鬼神和儒学的否定，经学逐渐走向了没落，据《三国志》记载，曹操明令官吏百姓不得祭祀，“及至秉政，遂除奸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祀由此遂绝”^②。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虽然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但是儒学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也没有完全退出美育领域。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儒家美育思想继续发挥着重要

^① 魏徵等：《隋书·百官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24页。

^② 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页。

影响作用，儒家美育的诗教、乐教传统得以继承，诗、礼、乐三位一体的美育模式得以延续。其次，士人个性觉醒后必然寻找新的理论归宿，这个理论归宿就是玄学。经学的衰落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魏晋知识分子在新的形势下融合儒道两家思想，大胆创新，于是玄学这一新的学术潮流逐渐兴起，并日渐成为魏晋时期的主流哲学。魏齐王正始年间，“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①，玄学由此产生。“以无为本”是曹魏时期玄学的立论依据，王弼等人宣扬无为、虚静的精神境界，认为精神乃是体无的表现，圣人以无为贵，故精神虚无冲和，但圣人五情同于凡人，不脱世俗。这种学说恰恰迎合了魏晋士人沉恋世情而又高自标持的人格理想。玄学转化和提升了传统的“中和论”美育思想，将传统的“中和”理念发展成为蕴涵着丰富存在论思想内涵的“和”的观念。儒家美育思想不断吸收、融化来自玄学的积极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以“和”为核心的魏晋美育理论。同时，“中和论”美育观也对玄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用，使玄学逐渐向新的哲学观念转化。再次，佛教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美育思想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既提升了中国古代“中和论”美育的思想境界，又深化了其精神内蕴。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借助道家、玄学术语阐释佛经、佛典，因而得到广泛的传播，其影响力也超过了中国本土的道教，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宗教；而且佛教逐渐与玄学交叉融合，许多佛学大师精通玄学，经常用玄学来解释佛学或者以佛学来解释玄学。同时，玄学关心宇宙本体论问题，热衷于“有无”关系的哲学思辨，不仅启发了佛教的思维方式，也启发了佛教以宇宙真相为主题论述佛法。中国佛教体系的建立也是以魏晋玄学的“形名学”与“言意之辨”为依据的。佛教与玄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关系极为密切，它们虽然一种是民间信仰，一种是学术思想，但是其中的相互影响确实是深远的，同时二者也共同对当时的美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显示出中国古代美育精神价值体系多元共生、互融

^① 房玄龄等：《晋书·王戎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36页。

互补的特点。南朝刘宋时的画论家宗炳曾深入分析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在人生精神方面的弊病与不足，他在《明佛论》中说：“悲夫，中国君子，明于礼义，而暗于知人心，宁知佛心乎？今世业近事，谋之不臧，犹兴丧及之，况精神我也（‘我也’，《弘明集》作‘作哉’），得焉则清升无穷，失矣则永坠无极，可不临深而求，履薄而虑乎？”^①宗炳认为，儒家只关注礼义而对人的心灵与精神方面关注不够。精神的缺失使人生难以自救，而佛教正可弥补这种心灵的空虚与孤寂，使人生变得圆润。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佛教在中国文化面临危机的时刻填补了其中的空缺，弥补了其不足之处，使中国人重构精神世界，也调整了社会美育机制。

众所周知，事物的发展是一个过程，往往是分阶段的，具有一定的阶段性。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领域中的一切现象都是作为一个过程而向前发展的。由于受到社会思潮及教育发展状况的影响，魏晋南北朝美育的发展时盛时衰，起起落落，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大致分为新的发展时期、深化发展时期和多元发展时期（基本对应于曹魏时期、两晋时期和南北朝时期），每个阶段的美育思想既前后承续，又都有一些新的变化。期间涌现出了阮籍、嵇康、王羲之、慧远、陶渊明、刘勰、颜之推等一大批美育思想家，提出了各种极具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的美育观点，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中和论”美育观。魏晋南北朝美育思想不仅体现在各思想家的著述中，还蕴含在《人物志》《世说新语》等人物品评著作中；不仅蕴含在文字著述中，在具体的教育活动中也得以践行。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庭美育（家族美育）、私学美育获得了较快发展，是那个动荡的历史阶段中国古代“中和论”美育观不断深化和曲折发展的反映。

总之，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中和论”美育观发展、深化和发生转向的重要阶段，有承传，也有开拓。一方面，这个时期的中国美学和艺术空前繁荣，这种情形促进了审美教育的空前发展，从而改变了历来

^① 严可均：《全宋文·宗炳》，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92—193页。

教育只重德育的状况，使审美教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美育思想原有的发展轨迹，无论是在美育思想基础或美育精神方面，在这个时期都发生了新的转换，出现了许多新的因素。儒学日益衰落，道教、佛教又先后崛起，遂使两汉时期形成的儒术独尊的旧的思想格局被彻底打破，代之以援道入儒，佛玄合流，乃至儒释道三家相互融摄、协调发展的新的思想格局，进而成为隋唐和隋唐以后中国传统美育思想发展演变的基本趋势。虽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美育思想及其实践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但总体上看它仍然属于中国古代“中和论”美育观发展的范畴。因此我们认为，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中和论”美育思想发展、深化和完善的重要时期。

第一节 新的时代思潮的影响

从一定意义上讲，魏晋南北朝美育是在儒释道三教合流、玄学兴起的大背景下形成、发展的，因而它深受儒学、玄学、佛教思想的影响，在美育的观点、形式、内容、理想、境界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美育史上发展最活跃、特色最鲜明的时期。

汉末的大动乱既使四百年的汉帝国崩溃瓦解，也使独尊的儒家经学走向衰败颓微。伴随着现实的苦难和信仰的危机，由道家思想发展而来的玄学，逐渐承担起帮助处于乱世中的文人士子们减缓乃至摆脱焦虑、彷徨、苦闷的功能；随着后期玄学清谈逐渐在现实中失去其思想的深度与精神的救助力量，佛学以它的“生死轮回说”将苦难现实的解脱寄托于彼岸，归旨于“空”，玄佛合流，共同抚慰着愁苦的心灵，同时也消解着对现实的抗争。此外，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以《列子》等为代表的含有纵欲主义思想的著作。哲学思想的多元与开放，极大地促进了魏晋人的思想解放、个性自由，开辟了广阔的精神领域。国家的动乱，社会秩序的解体，旧礼教的崩溃，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使文学艺术逐渐摆脱了政治和教育的附庸地位而获得了独立发展。书法、

绘画、音乐、建筑、雕塑等，也都以昂扬蓬勃的生机令人刮目相看。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先秦时期形成的“中和论”美育观发生了新的变化，走向了更为广阔的新天地。

一、社会思潮的大变动与大融合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最动荡的时代之一。

经济上，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土地所有权日益集中在豪强大族手里，与此同时，破产的手工业者和失去土地的农民不得不汇聚在豪强大族门下，成为被束缚在门阀士族土地上的依附民。这就构成了典型的以自给自足的地主庄园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经济形态，而这种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必然会带来审美文化上的深刻变化。

社会结构上，同封建大土地所有制这一经济基础相适应，门阀士族取代了秦汉世家贵族的地位。门阀士族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享受特权，相对独立。门阀制度在魏晋之际的形成，对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冲击和瓦解，从而为思想文化的解放奠定了阶级基础。

政治上，整个社会处于动荡不安和黑暗恐怖之中。先是三国之战，再是曹氏与司马氏两大集团之间的权力之争，后是西晋的“八王之乱”“永嘉之乱”，还有中央皇室与地方豪强、门阀士族之间，以及地方豪强、门阀士族之间的尖锐冲突等，真可谓政治险恶，战乱频仍，宦海肃杀，疫疾肆虐，哀鸿遍野，正如《晋书·阮籍传》中所说：“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①但是现实的黑暗恐怖在给人以朝不保夕的畏惧感的同时，也会产生另外一种效应，那就是导致诸如王道理想、皇朝权威、正统道德、伦常秩序之类往昔曾被视为神圣的东西，在被怀疑和疏离中走向黯淡甚至崩溃、瓦解。这就为社会文化思想格局的大调整提供了现实条件。

^① 房玄龄等：《晋书·阮籍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60页。

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巨大变化相适应，魏晋时期的意识形态和哲学思想也发生了深刻变革，出现了各种思想学说交汇融合的趋势，玄学走到了学术思想的前沿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导致了社会审美意识、审美观念和美育思想的巨大变化。

（一）经学的衰微与变化

众所周知，在汉代，“儒家著作被强行规定为全国必读之物，儒家经典成了一整套完全的学说，并且使整个社会制度都留下了儒学的烙印。人们最后赋予了儒教文献一种经典的作用……”^①“汉代的儒家思想所关心的是国家的稳定和等级观念，最后变成了一种经院式的哲学，其作用只不过是通过对权威文献的解释而使人们争论不休和玩弄字眼。这就削弱了儒家思想的自行发展以及解决文化和物质文明方面层出不穷的新问题的能力，而这些问题又是由于变化莫测的政治和社会风云所引起的。”^②

“汉魏之际，中华学术大变”^③，两汉时代所“独尊”的官方化儒学（经学）已趋衰微，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一是“经术之变，上接今古文学之争”^④，迷信荒诞的谶纬神学和枯燥繁琐的章句经术，已失去了思想活力和学术生命力，渐为士人厌弃；二是它所讲的纲常名教和道德伦理那一套学说，无法在当时混乱残酷、丑恶虚伪的社会现实中找到客观依据，因而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当时人们的怀疑和冷落；三是经学作为一种服务于大一统专制集权的理论工具，一时难以适应封建大地主庄园经济迅速崛起和门阀士族集团各自为政这一新的政治经济局面，自然要被暂时边缘化。

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各种思想学说同时兴起，一些“异端”思想流行开来，带来了社会思想和学术文化的相对自由及多元化，与大一统专制政治相联系的儒家思想一尊独大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当然，这并非

① [法]布尔努瓦：《丝绸之路》，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95页。

② [法]布尔努瓦：《丝绸之路》，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96页。

③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4页。

④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4页。

意味着儒学在此时期消亡了。其实，魏晋时期，经学仍然获得了一些发展。东汉末年，农民起义、军阀混战以及封建兼并战争使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社会动荡不安，但是处于南方的荆州地区，由于远离政治中心，战乱较少，百姓生活相对安定，加之占据荆州的刘表的倡导和支持，学术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甚至取得了一些新的发展。刘表在肃清荆州境内群寇后，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社会生产和学术研究的措施，如模拟太学，“开立学官，博求儒士”^①，起立学校，创建荆州官学，广泛搜集文献资料，汇集蔡母闾、宋忠等诸儒改定《五经章句》^②，于是在荆州就聚集了一大批鸿生硕儒，他们相互交流，精研群经，传道授业，培养学生，逐渐形成了以儒学研究为主的荆州学派。另据王粲《荆州文学记官志》记载，刘表“乃命五业从事宋衷新作文学，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赞之，降嘉礼以劝之，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耆德故老蔡母闾等负书荷器”^③，“训六经，讲礼物，谐八音，协律吕，修纪历，理刑法，六路咸秩，百氏备矣”^④。官方推重古文经学，官学重点讲授《易》《系》《书》《尔雅》《诗》《礼》《春秋》《尚书》等典籍，“于是童幼猛进，武人革面”，荆州因此成为当时的一个学术中心和思想交流中心，“自远而至者三百有余人”^⑤，并且形成了多个影响较大的经学门派。南齐王僧虔《诫子书》中就有“荆州《八表》”^⑥“《八表》所载，凡有几家”^⑦之说，可知那时荆州儒学发展还是相当兴旺的。鱼豢《魏略》中将董遇、贾洪、邯郸淳、薛夏、隗禧、苏林、乐详等七人视为儒宗，并将他们列入《儒宗传》。据《三国志·尹默传》载：蜀汉尹默“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

① 陈寿：《三国志·魏书·刘表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2页。

② 陈寿：《三国志·魏书·刘表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2页。

③ 严可均：《全后汉文·王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921页。

④ 严可均：《全后汉文·王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921页。

⑤ 严可均：《全后汉文·王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921页。

⑥ 萧子显：《南齐书·王僧虔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598页。

⑦ 萧子显：《南齐书·王僧虔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599页。